

權力運作與中國勞動力供給的政治社會學

● 劉擁華

一般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是充足的，勞動力緊缺的現象理應不會發生。可是，這一現象的確正在中國發生。了解勞動者行動的動機，是把握中國勞動力市場趨勢的切入口。我們的問題是：1978年以來勞動力市場的供和求受何種因素影響而導致基本均衡？供求的波動又是因何原因而發生？本文試圖從社會學的角度提供一個初步的解釋。

一 如何理解勞動力市場？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勞動力市場的緊張當然緣於勞動力的供給不足。勞動力供給是指在一定的市場工資標準下，家庭或個人願意並且能夠提供的勞動時間。經濟學分析勞動力供給，主要考慮市場工資水平，對其他因素很少加以考慮。這種視角忽視了勞動力供給主體決策的複雜性，沒有意識到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對勞動參與意願的影響。與此同

時，這種看待勞動力供給的方式，亦將勞動力市場當作一種自生自發的制度安排，看不到影響勞動者參與勞動力市場意願的政治機制和權力運作。

在理解勞動力配置以及現代經濟發展的諸理論中，劉易斯 (William A. Lewis) 的兩部門發展模型 (Dual Sector Model) 已經成為經典。兩部門是指「維持生計部門」(subsistence sector) 和「資本主義部門」(capitalist sector)。在前者，人們獲得生活資料的數量由習俗決定；而在後者，生活資料的數量則由該部門的平均生產率決定。劉易斯假設，當後者的工資率超過前者中生計維持收入水平約30至50%時，勞動力就會從低生產率的維持生計部門流向到高生產率的資本主義部門。他還指出，如果通過提高習俗所決定的生計維持收入水平，而維持生計部門自身又無法通過提高生產率或者別的途徑來滿足這種收入水平時，資本主義部門在不提高其工資的基礎上，也能獲得所需的勞動力^①。

一般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是充足的，勞動力緊缺的現象理應不會發生。可是，這一現象的確正在中國發生。了解勞動者行動的動機，是把握中國勞動力市場趨勢的切入口。

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嚴重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二元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就此形成。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不存在統一的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勞動者也不可能參與到任何他們想參與的勞動力市場。

然而，在勞動力市場供求達致均衡方面，市場機制常常並不起決定性作用，而社會習慣或政治機制則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貝蒂森 (D. G. Bettison) 用「維持基本生計的工資傳統」來說明工資水平是由傳統而非市場所決定。這就是說，實際工資率一開始固定於這樣一種水平上，即首先要為一名單身工人在資本主義部門工作期間提供生計，而且也要滿足其(繼續留在農業部門裏的)家人對現金收入的迫切需要。在這裏，市場機制其實並不起多大的作用^②。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勞動力短缺也有可能伴隨着實際工資的下降，反之亦然。這背後的因素既是結構性的，也是基於對生計水準予以限定的特定文化價值。在這種市場並不起決定性作用的情形之下，或者說在這種習慣的工資水平下，作為影響勞動力市場運行的諸多因素之一，國家的作用就凸顯出來了。

就中國而言，以19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為標誌，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嚴重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二元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就此形成。事實上，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不存在統一的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勞動者也不可能參與到任何他們想參與的勞動力市場。1978年以來，在國家的推動下，勞動力市場化改革才使這一現象有所改變，但二元戶籍制度以及無法落實的市民待遇等現實困境，依然使得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遲遲難以形成。在這種情形下，如何來看待僱傭勞動力大軍源源不斷地湧向城市？是甚麼因素驅使農業勞動者轉變成僱傭勞動力？為甚麼僱傭勞動力有時在某些地方又會出現緊缺現象？我們試圖基於「社會學的想像

力」，發掘這些現象背後的社會文化因素。

在社會文化因素當中，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尤為重要。意識形態與國家政治運作和農村社會經濟關係變化息息相關。其中突出的意識形態變遷，一方面是國家經由戶籍區隔所建構的城市想像，另一方面是在日常生活當中所發生的關於「必需品」觀念的轉型。人們之所以對必需品觀念發生轉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國家所實行的農業稅收政策以及生產資料的商品化。這兩者導致了農村家庭對現金收入的迫切需求；而當農村經濟無法滿足這種對現金收入的需求時，農村居民不得不通過出售剩餘農產品和出賣勞動力來獲得現金，從而使得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從維持生計部門轉移到資本主義部門。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也深刻地重構着鄉村社會。所有這一切，背後的推動力量都是國家權力以及國家權力所建構的城市想像。

這意味着，我們對資本主義部門發展的分析需要擺脫以下預設——即導致僱傭勞動力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終對農村發展是有益的，是自發的和理性化的過程，它完全或幾乎完全是純粹由「市場力量」(也就是個人在市場中的自由選擇)所誘發和推動的，而種種公開或隱蔽形式的強制，並沒有起到過任何作用，或只是起到次要的、微小的作用^③。這種「市場的神話」完全抹去了國家強制的力量，中立了政治機制和意識形態的價值立場。其實，所謂個人在市場中的「自由選擇」，是被國家力量所形塑的。如果不能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對勞動過程和勞動力配置的理解就會完全局限在經濟學的維度，而意識不到社會結構和政治機制的重要性。

二 歷史視野中的勞動力供給

根據阿爾利吉 (Giovanni Arrighi) 的研究，在二十世紀早期，非洲羅得西亞 (Rhodesia) 的勞動力市場是短缺的，並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這是由於早期的白人統治並沒有導致農村經濟關係結構的轉變，即並沒有導致維持生計部門的結構性失衡，土地和生產工具以及生產率都能保持在相當的水平，這使得由習慣所決定的生計水平不至於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是因為通過出售農產品掙得的現金收入和通過僱傭勞動可以掙得的現金收入相比，前者的工作努力—價格比 (effort-price) 較低^④。實際上，如果人口相對土地的壓力較小以及剩餘農產品的市場價格較高，在既有的土地、技術等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村居民的勞動生產率也能保持在相當高的水平。但如果存在着工時的部分閒置 (無論是結構性還是季節性的閒置)，農村居民就會存在參與僱傭勞動的意願^⑤。因此，相比出售剩餘農產品以獲得現金收入，羅得西亞勞動者出售勞動力獲得現金收入的意願不高。

在阿爾利吉看來，非洲人參與勞動力市場比率低的原因，不能從其對市場機會缺乏意願或者對市場機會的把握滯後來解釋，而是需要從非洲人參與貨幣經濟的「可有可無」特徵和通過出售農產品可獲得收入的工作努力—價格比相對較低這兩個方面來尋找原因。在這裏，阿爾利吉區分了社會的「必不可少的」(necessary) 和「可有可無的」(discretionary) 物質需求。他意識到，在羅得西亞的農業經濟中，存在着生產資料和生存資料之間的大

體平衡，這兩者是人們「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沒有額外貨幣需求的情形之下，參與貨幣經濟對於滿足非洲人的生存必需來說，都是「可有可無」的事情。因此，出售農產品獲取收入的工作努力—價格比相對較低，是抑制非洲人參與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因素^⑥。

接下來，阿爾利吉提出一個問題：在此情形下，這種狀況是如何打破的呢？換言之，是甚麼因素致使農業勞動力成為僱傭勞動力，從而實現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呢？他指出，是政治機制而不是市場機制使然。

政治機制有三種具體的表現：(1) 直接強制僱傭勞動；(2) 課稅；(3) 土地徵用。在羅得西亞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當局曾採取強制僱傭勞動的方式來彌合資本主義部門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缺口^⑦。除此之外，課稅也是一種迫使非洲人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方式。但是，在農產品銷售收入的工作努力—價格比並沒有上升的情形下，課稅依然不能促使勞動者參與勞動力市場，成為出賣工時的僱傭者。實際上，土地徵用發揮着比課稅更重要的作用。

在阿爾利吉看來，最為關鍵的政治機制運作，是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強佔並徵用了農民的土地。本來，和維持生計部門相比，資本主義農業在收入提供上的競爭力並不強；由於季節性價格波動等因素的影響，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在市場環境中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推動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的並不是市場力量，而是其他機制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其中，國家權力通過農業部的建立而推行有利於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的政策，極大地壓抑了維持生計部門的生產效

在阿爾利吉看來，非洲人參與勞動力市場比率低，需要從非洲人參與貨幣經濟的「可有可無」特徵和通過出售農產品可獲得收入的工作努力—價格比相對較低這兩個方面來尋找原因。

在資本主義工業的競爭壓力之下，人們逐漸地放棄了傳統的手工工業。這一過程不僅破壞了社群團結的紐帶，而且人們不得不通過出售農產品和勞動力來滿足對現金的迫切需求。

率，提高了這一部門的工作努力—價格比。

在上述政治機制的作用下，農業勞動者不得不出賣工時，被迫走入勞動力市場，成為僱傭勞動力。

上述三大因素使得農民不得不參與到貨幣經濟中去，從而深刻地改變了農村社會經濟關係。尤為關鍵的是，不但客觀存在的稅收負擔以及生產資料的商品化催生了對現金貨幣的緊迫性需求，而且之前由習慣所決定的生活必需品觀念亦被社會意識形態所改造及建構。換言之，「可有可無的」消費品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斷變成「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這無疑加深了農民對現金貨幣的需求程度。一旦剩餘農產品的出售不能滿足其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他們就會被迫出賣自己的工時，成為勞動力市場的僱傭勞動力。

在傳統經濟關係中，由習慣所決定的生活必需品大多是通過物物交換的形式實現的，並不需要多少現金。人們習慣自己動手製作生活必需品。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存在着許多農村手工工業；這些非農業生產活動為社群帶來了些許現金流動，大致能夠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但在資本主義工業的競爭壓力之下，人們逐漸地放棄了傳統的手工工業。這一過程不僅破壞了社群團結的紐帶，而且人們不得不通過出售農產品和勞動力來滿足對現金的迫切需求。

在這個過程當中，阿爾利吉區分了小農經濟剩餘吸納的三種形式：(1) 可有可無的消費；(2) 社會活動必需的非生產性吸納；(3) 生產性投資。這裏的「剩餘」是指淨產出合計值和農民生活資料之間的差額^⑥。這一區分

為甚麼是有意義的呢？如果小農經濟有能力不斷地積累剩餘、創造剩餘、擴大剩餘的規模，那麼，這意味着小農經濟在與資本主義部門的競爭中能獲得有利地位。但實際上，小農的剩餘用作生產性投資的比例很小，一方面是由於剩餘被國家以稅收等形式所徵收，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的入侵使得「可有可無的」消費變成了「必不可少的」消費，增加了現金需求。最後一點是，市場不確定性使得為加強社會凝聚力的某些非生產性剩餘吸納不得不存在。但是，在小農經濟中，人們還是進行了相當數量的生產性投資，這主要是指牛和犁在農業中的廣泛使用。但隨着土地的緊缺，這種投資就逐漸喪失其原初的意義。

到1920年代，牛和糧食（尤其是玉米）價格的暴跌，直接改變了非洲農民相對於資本主義的地位^⑦：

使非洲人參與農產品市場的工作努力—價格比猛增，其直接後果是非洲人參與勞動力市場的程度急劇增大。結果，僱傭勞動和農產品銷售作為非洲人現金收益來源的相對重要性被顛倒過來：在二十世紀初，農產品銷售收入約佔當地非洲人全部現金收益的70%，但在1932年，該比重不足20%。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地等生產資料短缺的情形之下，小農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集約化生產」方面，利用化肥等技術便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環節。然而，由於剩餘規模小，小農並沒有能力實現技術創新和轉變生產模式以應對市場競爭。換言之，土地規模有限和生產性資本短缺使得農業部門還是維持在生產生活資料的水平之上，

三 中國勞動力供給的 國家因素

並不能從其中轉移出勞動力和其他的生產要素，因為這樣的轉移對於維持生計來說是有巨大風險的。這樣一來，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不斷弱化，農業的工作努力—價格比不斷攀升，使得愈來愈多的農民不得不依賴掙取工資勞動者的匯款以滿足其現金需求，而不是試圖去打破現有的經濟關係和生產模式，去進行技術創新。

正因為通過出售農產品參與貨幣經濟變得愈來愈不經濟，因此，如何通過在農業領域運用全新的技術來釋放勞動力就變得十分迫切了。小農經濟中諸多生產性投資都是基於釋放勞動力的考慮而進行的，而生產性投資又進一步加劇了小農對現金的需求。與此同時，小農也逐漸地意識到，無論如何，在短期內都看不到農業使現金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可能，因此，在剩餘吸納模式中，教育支出變得更加重要。在農村，更多的現金被配置到子女教育上去了，教育開支日益成為「必不可少的」消費。從農業投資中轉移到教育上的工時和資金，可能成為農民無產階級化的最重要力量。

隨着資本主義農業的逐漸壯大，政治機制在兩個部門之間的相對地位方面發揮的作用愈來愈弱，此時市場機制在擴大兩個部門之間的生產率以及相對地位方面的作用則增強。阿爾利吉說^⑥：

我們可以假定，非洲農民剩餘創造能力的萎縮是和資本主義農業剩餘創造能力的穩步增強相對應的，這種狀況逐漸降低了政治機制在加深羅得西亞經濟的二元性方面的重要性。

從這裏可以看出政治機制與市場機制交替作用的複雜事實。

阿爾利吉對羅得西亞勞動力市場的研究對我們頗有啟發，它突破了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分析框架，使我們能夠真實地回到歷史本身的實踐邏輯上來看待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在本質的意義上，經濟學是反歷史的，而社會學則試圖真切地把握住歷史。

在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形成過程中，國家通過政策手段從多方面促進了勞動力的供給。因此可以說，在勞動力市場形成的初期，是國家而不是市場起着主導性的作用。自1978年以來，國家有意逐漸地從父權性國家向契約性國家轉變，家庭作為獨立核算的經濟單位而存在，個人從父權式的集體中擺脫出來獨自面對市場和國家。

在整個1980年代，國家一再縮減計劃收購的品種和數量，改統購派購為合同收購，宣布農副產品完成國家收購後可以自由交易，允許私人長途販運，允許農民進城經商，開展農產品期貨交易。國家還宣布改革農村供銷社和信用社制度，恢復其民營性質，並重新實行股份分紅制；國家允許私人投資大型生產資料和創辦個體資本，默許並進而正式承認僱工超過八人以上的私人企業的合法地位；國家鼓勵農民從事非農活動、開放小集鎮和中小城市的就業和創業，進而改革了大中城市國營企業的招工制度，對農民工開放城市勞動力市場^⑦。這一系列的措旨在使農業勞動者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成為僱傭勞動力，從而獲得更多的現金貨幣收入。

在1980年代推進市場化的諸多政策中，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制度變遷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沉重

在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形成過程中，國家通過政策手段從多方面促進了勞動力的供給。因此可以說，在勞動力市場形成的初期，是國家而不是市場起着主導性的作用。

在1979年之前的農村，人們並不需要付出多少現金來維繫人際紐帶，社會關係建立在集體性的政治機制和集體社區的相互依存之上。但現在人情往來對現金收入提出了比較高的要求，這是一項有關「面子」的緊迫性需求。

的農業賦稅也必須以農民家庭為單位來承受。在完成各項稅收負擔以及維持基本的生活資料之外，農民基本上沒有太多的農產品可以出售。同時，醫療和教育逐漸市場化，也使得人們對現金收入的需求更為迫切。為了應付繁重的稅收負擔和獲得一定的現金收入，在無法實現規模效益的情形下，農民不得不想方設法通過「集約化生產」來提高平均產量，也就是增產增收。因此，我們便看到，自1980年代以來，農業耕作不得不求助於相對大量資本的投入，比如作物種籽、動物飼料、耕作機械、農藥化肥、培植工具等，都是以現金資本的形式投入到農業領域中去的。在這裏，我們實際上看到了一幕鄉村社會與國家博弈的無奈和緊迫，也看到了宏觀制度安排是如何形塑微觀實踐領域的。

現金貨幣需求具有累積的特性，這意味着農村社會各項活動都逐漸地涉及到現金，比如醫療、教育、婚姻、人情往來等等，這些需求愈來愈變得「必不可少」。換言之，這種對現金收入的緊迫性需求，不但表現在因國家政策導致的購買生產資料所需等方面，也表現在日常開支中新增的「必不可少的」消費方面。在1979年之前的農村，人們並不需要付出多少現金來維繫人際紐帶，社會關係建立在集體性的政治機制和集體社區的相互依存之上。但在之後的鄉村社會，人情往來對現金收入提出了比較急迫的要求，這是一項有關「面子」的緊迫性需求。教育與婚姻更是如此，子女多的家庭，教育開支是一項佔極大比重的開支；而婚姻的花費少則幾萬，多則十幾萬，建新房是男子婚姻的必備項。

在一個不斷市場化的社會中，愈來愈多「可有可無的」需求成為了「必

不可少的」生活所需，甚至關涉到「面子」問題，這些生活所需比基本的生存所需更為緊迫。所有這些開支都會減少農民的生產性投入。這使得農業剩餘（包括出賣工時的現金收入）都被轉移出了農業生產性投資領域，使農業日益缺乏競爭力。於是，農業勞動者不得不進入到勞動力市場，成為僱傭勞動力。

在農民的經濟行為中，其不多的財富積累主要用途是甚麼呢？或者說其剩餘吸納的模式是怎樣的？我們基於中國的實地考察所得出的結論與阿爾利吉的結論有一定的出入。

在筆者曾經生活過的村莊（位於湖南北部），農村剩餘主要用於教育投資和基於婚姻考慮的房屋修築。教育投資是長期投資，是一種想方設法離開土地的努力；修築房屋是短期投資，是為青年男子結婚所用，更是在村莊中獲取「面子」的最為直接的途徑。以最近幾年的情況來看，有子女就讀小學的家庭，一年教育投資大概在1萬元左右。一個孩子如果要完成初中學業，需要2至3萬元；完成高中學業，需要4至5萬元；完成大學學業，則需要花費10多萬元。考慮到一般家庭的收入水平，這樣的花費是驚人的。如果沒有務工等外來收入，單靠務農來支付學費、完成學業幾乎是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據筆者觀察，近幾年農戶對子女的送讀非常熱情（這裏有一個性別歧視的問題，在這個村莊，在經濟有限的條件下，一般都是優先考慮男孩就讀），用他們的原話來說，就是做父母的，要送子女「有書讀到無書止」。也因此，如果沒有非農業收入予以補充，許多家庭都會背負着沉重的債務。在他們看來，只有

孩子考上大學，才是真正的有出息，為此，即使負債也值得。並且，在這個村莊，別的钱不好借，但如果子女讀書出現困難，親戚朋友都非常樂意幫忙。這樣一種心情，也反映出農民急於退出農村的願望。

在改革開放的早期，可以說，驅使農民勞動者走向勞動力市場的動力，不但是對現金收入的緊迫性需求，也摻雜着在社區中對「面子」的維護^②。換句話說，在社區中，某一農戶如果沒有非農業收入，其經濟狀況不會太好。或許這種工資收入並非緊迫性的，但在相互比較中卻是「必不可少」的。在1980年代初期，發家致富的意識形態被新的制度激發出來，但隨即因為稅賦等原因而趨於破滅。農民逐漸意識到，真正能夠賺取現金收入的渠道不是農業，而是參與到勞動力市場的經濟行為；家庭之間的「面子」也唯有經由參與勞動力市場才能大體上獲致。

隨着時間的流逝，「面子」日益被事業發展前景、工作環境、體面的衣着等所表徵，而不是簡單地局限於收入。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第二代農民工已不局限於在流水線上日復一日地勞動，獲取有限的現金收入。很多農民工都在試圖轉型，夢想擁有自己的事業，依靠自己的社會關係和聰明才智獲取體面的收入。可以說，「面子」是一種激勵機制，這種機制並不完全受制於經濟需求或者國家機制的作用，而是可能與這兩種機制一併發揮作用。

更有甚者，我們在中國不但沒有看到阿爾利吉在分析羅得西亞勞動力市場時，發現因土地等生產資料的緊缺所造成的工作努力—價格比提升的現象，反而看到從1978年以來，尤其

是1990年以來嚴重的土地拋荒現象。同時也意識到無論工資水平如何，即使相比物價飛漲，實際工資可能有所降低，農村勞動力還是不斷地湧向城市成為農民工。1990年代以來的事實是，土地不但沒有成為貴重的生產資料，反而可能成為一種累贅，這不但是國家稅收政策規定剩餘農產品不得不繳納給國家，也是化肥種籽等生產資料商品化導致的成本增加以及對現金收入的緊迫性要求。在此緊張情勢之下，勞動力市場的供過於求就不難理解了。

在2000年前後，筆者回到前述的村莊做過一段時間的實地考察，發現土地的價值已今非昔比。承包經營土地共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家裏沒有人外出打工的農戶，一般一人耕種1.5畝土地。經過一年的辛苦勞作，略有收益。如果不遇上天災人禍，沒有兩個子女同時上學的農戶，經濟上還過得去，至少不會有太多的負債。但這樣的農戶，一般都有子女在就讀，所以生活還是比較困難，知識程度也不高。之所以留在農村種地，可能是家裏需要人照顧，也可能是年齡太大，還有可能是沒文化，出去不了。

第二種情況是，農戶中有外出打工的，或者有子女上大學的，這些在村裏種地的農民一般年齡偏大，一人種一畝地左右。有子女上大學的農戶種地都很積極，希望盡量多掙點錢，平時也出去就近做點零工。對於那些家裏沒有負擔的農戶，種田地的目的不是為了掙多些錢，而是找點事做，有糧食有菜吃。在他們的意識中，農民是沒有退休年齡的，是農民就得種地。但他們都有外來的收入，經濟比較寬裕；耕種土地也不是很用心，只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第二代農民工已不局限於在流水線上日復一日地勞動，獲取有限的現金收入。他們試圖轉型，夢想擁有自己的事業，依靠自己的社會關係和聰明才智獲取體面的收入。

中國勞動力的供給在政治機制的強力干預下，從一開始就是供過於求的。各種各樣的對現金需求的緊迫性使得如果沒有非農業現金收入的補充，一家一戶就連維持基本的生計都不可能。

是應付一下而已，一些重活累活，一般都會花錢請人做。

第三種情況是「半退出型」的，這樣的農戶全家已經搬離農村，住在城鎮，但田地沒退。他們農閒時在鎮裏做點生意，農忙時回到村裏種地，兩頭跑。種地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有口糧吃（對於農民而言，買糧食吃，總覺得不是那麼回事）；另一方面也是擔心生意做不下去了，還有條退路。當然，他們耕種也不會太用心。

從這裏我們看到，農業已經逐漸地喪失其提供現金收入的能力，而演變成更具傳統意義的生活資料的生產。據筆者的觀察，幾乎所有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出去打工了，原因在於從農業中可以獲得的現金收入遠遠不能應對沉重的現金貨幣需求。

我們可以說，在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農村中，國家權力一方面通過契約的方式對農業實行繁重的稅賦徵收，另一方面又從農村卸除了其之前所承擔的集體性責任，將所有的風險和責任推給個人和家庭。我們看到，醫療、教育等逐漸地走向市場，引發了一系列的「未預期後果」。最為重要的後果便是為了應付風險和現金需求，農業勞動者逐漸轉變為僱傭勞動力。在政治機制、市場機制與微觀「面子」機制的相互作用下，農民被迫進入勞動力市場，出賣工時，成為資本主義部門的僱傭勞動力。所以，與阿爾利吉所看到的情形相反，中國勞動力的供給在政治機制的強力干預下，從一開始就是供過於求的。各種各樣的對現金需求的緊迫性使得如果沒有非農業現金收入的補充，一家一戶就連維持基本的生計都變得不可能。

國家不但通過對農村社會的「干預」和「退出」促使農業勞動力向僱傭

勞動者轉變，在農業社會之外，國家和市場還通過集中資源實現對大型城市的建設，從而產生出吸納勞動力的另外一種機制。我們稱之為城市之於農村社會的「象徵暴力」。我們從認知和觀念上將城市接受為一種理想化的生活和工作場所，從價值上建構出城市和農村的二元對立，從而對鄉村社會予以貶損。基於此，城市具有一種基於「象徵暴力」的優勢地位。

由於城市集中了大部分的公共資源和就業機會，因此城市是實現夢想和成就的地方，能夠進入城市生活一直是中國人的追求。進而，我們才能意識到，城市如此強大的吸納能力，或者反過來說，鄉村社會不斷地失去其吸納能力，並不能從人口相對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壓力來理解，而是必須從國家等政治機制的運作來理解。與此同時，國家和城市對勞動力的吸納，不但不是在工資水平達到預期的意義上進行的，甚至在工資水平持續下跌的情況下亦能順暢進行。對這種現象，我們不得不追溯到一種文化習慣或者說一種「象徵暴力」的維度。

換言之，城鄉二元體制始終沒有消除城鄉之間的交流，更沒有消除城市作為一種符號象徵的優越性。相反，長時間的隔離反而將城市的象徵地位提高到一個無與倫比的位置，這就類似於宗教儀式中的「禁忌」——神聖的事物，需要「禁忌」予以保護。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流動的加劇，則從現實的層面闡釋着城市作為「象徵暴力」的現實神話。大量的年輕人湧入擁擠的城市，不能僅僅從經濟主義的角度來予以闡發，而更是需要從文化、象徵的角度予以解釋。正是長時間的阻隔所產生的某種神聖性，以及社會流動所生成的現實神話，都在日

益強化着城市作為一種暴力的有效性。這種有效性，我們稱之為「象徵暴力」。

參與勞動力市場的過程亦是在建構新的認同與建構「新人」。在各種象徵力量的作用下，鄉村社會與農業經濟已經喪失了其生成意義與建構認同的能力，農民已經在某種意義上被污名化和隱喻化，成為落後的別稱。今天人們所認同的是脫離農業生產過程的市場經濟行為，看重的是所謂「經濟能人」。因此，是市場和各種權力關係在建構着新的社會認同與身份意識，而不是傳統的親緣或者職業地位。這更進一步強化了以城市想像為標誌的「象徵暴力」對於鄉村社群的解構與摧毀，從而亦使得在沒有制度化保障的前提下，農民工的再生產不得不依賴於社群社會網絡，農民工自身無法形成確切的身份認同與公民意識，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始終無法得以完成。不得不說，這是中國社會的弔詭。

四 「承認政治」的來臨

我們初步分析了1970年代末期以來國家政治機制、市場機制、城市象徵以及微觀「面子」機制對勞動力市場的共同形塑過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歷程，形塑勞動力市場的力量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其中最重大的變化莫過於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的出現——從對現金收入的需求轉換到對「公民權利」的需求，與簡單的經濟訴求相比，這是一種對自身作為「公民」的社會和政治訴求。

在種種困境中，勞動力主體往往會做出策略性的選擇。參與勞動力市

場，出賣勞動時間，只是一種最為簡單的獲取現金收入的方式。三十多年來的觀念轉變表現在，由習慣所決定的付出勞動取得報酬的準契約式的慣性觀念，逐漸被「去勞動化」的觀念所取代。所謂「去勞動化」，是指區別於繁重而簡單的工廠勞動而存在的一種類似於辦公室式的工作以及非正式就業的生意人形象。1970年代之後出生的一批人，尤其是男性，已經逐漸認識到打工生涯的局限性，因此，他們往往會選擇做點生意或者進入辦公條件比較好的地方從事工作。這種工作要麼是脫離勞動力市場，要麼是在勞動力市場中佔據高端位置。換句話說，工廠勞動還是側重身體性的參與，它具有典型的身體形象，比如體力活等；但「去勞動化」的勞動則試圖擺脫身體參與的形象，而更強調社會關係、人力資本與市場能力。

我們可以將側重身體參與的勞動稱為「身體化勞動」。自1970年代末以來，勞動作為一種改變自身與改變世界的「神話」而得到無限的張揚。「勞動致富」成為激動人心的時代話語，勞動成為實現人生目標的現實手段。這個時代展現了一個可以通過勞動奮鬥而改變現狀的可能性。勞動作為歷史實踐，在改造勞動主體的同時，也改造着外部世界。所以說，1980年代的「勞動的神話」是與「改革話語」對「勞動」合法性的承認同時出現的。它給了我們這樣一種可能性：通過「勞動奮鬥」，我們可以超越階層出身；通過「勞動奮鬥」，我們可以實現精神自我。「勞動奮鬥」本身蘊涵着價值實現。

但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勞動「改變世界」的面向不斷弱化，「勞動」被嵌入到不斷固化的政治經濟關係之中，「勞動」喪失了與世界的關聯^③。

今天，勞動「改變世界」的面向不斷弱化，「勞動」被嵌入到不斷固化的政治經濟關係之中，「勞動」喪失了與世界的關聯，通過「身體化勞動」而獲得身份認同和社會意義的做法已經失去了往昔的意義。

從「身體化勞動」到「去身體化勞動」的演變所包含的深刻意涵，主要是如何重建勞動關係，以及通過這種對勞動賦予意義的過程重建人的價值與尊嚴。這是一場「承認的政治」。

因此，進入到新世紀，隨着人力資本不斷加強以及勞動世界的政治經濟結構轉型，這種通過「身體化勞動」而獲得身份認同和社會意義的做法，已經失去了往昔的意義。今天，勞動階層如何可能在基本的工作條件、基本的公民權利、基本的社會人的意義上確立起全新形象，是「去身體化勞動」的時代背景。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看到，與改革開放初期一樣，勞動力供給不能完全受制於市場工資率的經濟學解釋，而是需要一種社會學的解釋、一種文化與社會結構的洞察。

2003年以來首先出現在中國沿海地區、後來蔓延到內陸的「民工荒」，就是這種對完全「身體化勞動」的拒斥。2008年以來的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也是對這種無視社會資本，亦無視勞動力再生產的資本主義的反抗。可以說，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決定勞動力供給的因素，已經從政治機制和市場工資率等，部分地轉變為對人的尊重。或者說，從「身體化勞動」到「去身體化勞動」的演變所包含的深刻意涵，主要是如何重建勞動關係，以及通過這種對勞動賦予意義的過程重建人的價值與尊嚴。這是一場「承認的政治」。就此而論，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它要求農民工的城市化和市民化，賦予他們基本的城市市民權利。

但是，作為人類的價值與尊嚴的意識形態，對於普通人而言還停留在「面子」的層次。從勞動力初級市場到勞動力高端市場尋求工作，不但是基於對現金收入的需求，而且也是一種社會要求，這就是「面子」。在複雜的人際比較中，人們往往不但看重職業的工資水平，也愈來愈注重職業所表徵出來的「面子」。所以，「面子」作為

一種行為策略始終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作為一種本土性的文化特質，「面子」所發揮的作用顯然具有局限性。如何突破這種局限性呢？還是要回歸到一種「承認的政治」上來，尋求作為人之為人的基本價值和民主權利。

註釋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阿爾利吉(Giovanni Arrighi)著，張群群譯：〈歷史視野中的勞動力供給——羅得西亞非洲農民無產階級化研究〉，載許寶強、渠敬東選編：《反市場的資本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頁197-98；202；200；206；211-12；213；222；227；234。

④ 阿爾利吉認為，「工作努力—價格比」對一種沒有任何有關工資的社會現象的經濟來說，是唯一一個尚可接受的成本範疇。它指的是獲得一個單位（按實際價格衡量）的現金收入所必須付出的給定苦力活兒的工時數量。參見阿爾利吉：〈歷史視野中的勞動力供給〉，頁247，註釋12。

⑩ 周其仁：〈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係的變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4年總第8期，頁86。

⑫ 閻雲翔在對「中國經濟奇跡」的文化解讀中，曾經提到「面子」作為一種文化機制在微觀層面上對個體的激勵。2010年6月筆者和幾位朋友與閻老師有過一次小規模的座談會，閻的觀點對筆者深有啟發。參見〈「個體化與中國經濟奇跡的另一種解釋」座談會在我校思想文化……〉，思與文，www.chinese-thought.org/bsxw/008287.htm。

⑬ 黃平：〈從「勞動」到「奮鬥」——「勵志型」讀法、改革文學與《平凡的世界》〉，《文藝爭鳴》，2010年第5期，頁48-55。

劉擁華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